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中）

——兼评冯其庸同志《论庚辰本》

王毓林

第二章 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版本构成

己卯本既然不是庚辰本的底本，己卯本避“祥”“晓”这两个只有本家族晚辈才可能避讳的字，在庚辰本上为什么也出现了一个缺笔的“禳”字呢？

我认为，对于庚辰本上这个“禳”字，既不能笼统地肯定它是避怡亲王永祥之讳，也不能轻易地说它是一个错字。而应当从多方面，尤其是从对这两个重要抄本的对比研究中寻求答案。只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列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材料的不断发掘，仍有最终弄清的希望。这里，将自己的分析叙述出来，以请专家们指正。

一、己、庚两本前四十回的比较

据统计，己、庚两本在前四十回的异文有近千条左右，属于文字修订方面的异文不下六百条，这同蒋维钺先生的统计大体一致^②。仔细对比分析这些异文，庚本的文字比己本的文字为佳。

此点亦与蒋先生的看法相同。蒋先生曾列举了一条很好的证据：

第三回黛玉入荣府后首次在贾母屋内用膳的座次描述：“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以上这一段两本相同，接下就不一样了：

怡：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左边第二，惜春右边第二。

庚：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来。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又坐右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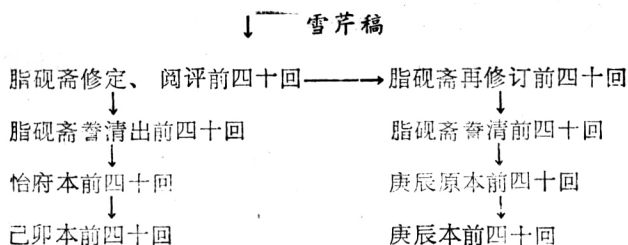
从表面看，这里好象是脂庚本有误：探、惜二人怎么都坐“右第二”，而把“左第二”放空着呢？但深究下去便觉脂庚本改得精细。因为若按怡本，王夫人便没有坐位了；而按庚本，已经把探、惜安排到“右第二”合座，腾出“左第二”让王夫人坐在黛玉下手，为客人“进羹”。从蒋先生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庚辰本的文字是在己卯本文字的基础上又经过修改的，这样细致的修改很难说是出于传抄者之手。

再举一例，己本第一回描写士隐与一僧一道对话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物，或可一见否？”那道人道：“若问此物，到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第6至7页）

这段文字是有矛盾的，因为此段之前有“那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的叙述，可知“蠢物”被僧人所携。到了这里先是道人答问，再是道人“取出递与士隐”而后僧人又将“蠢物”从士隐手中夺回，这其中“道人”横插了一杠子，使得前后文意矛盾。我们看庚辰本则是：“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第11页）。很明显，庚辰本在文意上是通顺的，这也证明庚本是在己本的基础上又经过修改的。这样细致的修改，不太可能出自传抄者，而是脂砚斋在己

卯本之底本——怡府本的底本前四十回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的结果。现把这一推测列成草图便是：



此图所列的只是己、庚两本前四十回来源及其形成的约略推测。

梅节先生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之底本——怡府本的过录本（或再过录本）。这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分析过，庚辰本和己卯本在文字修订方面的异文多达六百余条（其中有些是非常细致的修改），这些数量既大、文词又精细的改笔，不可能出自传抄者之手。所以，庚辰本前四十回只能来源于怡府本之底本。而这个底本在怡府本之后，庚辰本之前又经过作者、或批者在文词方面的修订，修改者或是曹雪芹、或是脂斋砚。

二、两本后四十回的比较

庚辰本与己卯本在后四十回异文不少，但因庚本后四十回愈抄愈糟，很多异文是因庚辰本的误、漏抄造成的。剔除此类异文之后，属于文词修订方面的异文充其量不过百余条。有些异文两本皆通，故很难确定孰先孰后，如：

- | | | |
|----|---------------|----------|
| 己本 | 每日早起睡晚 | （第747页） |
| 庚本 | 每日早起晚睡 | （第1393页） |
| 己本 | 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当面细问 | （第723页） |
| 庚本 | 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面问 | （第1368页） |

蒋维钺先生在对勘中发现一些庚正、己误和庚本改正己本讹借的

文句。如：

己本 别不佯^点愁和我笑 （第798页）

庚本 别只佯^点愁和我笑 （第1475页）

己本 因又年终岁^点过 （第979页）

庚本 因又年终岁^点逼 （第1699页）

再举一例：

己本 这日正^点等，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第988页）

庚本 这日正^点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第1708页）

蒋先生认为：“由于庚本后四册抄手水平不高，故很难相信他们有补正底本讹漏的能力。”这分析当是正确的。所以，己卯本和庚辰本后四十回不是“过录关系”，而是出于同一祖本，这个祖本在它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底本传抄的间隔时间内，脂砚斋没有作系统地修订，很可能是又誊清过，但那也只是原文的过录而已。现在的异文，一部分是脂砚斋在誊清时随笔的修改，一部分是在传抄中形成的。

三、两本中的避讳问题

吴恩裕先生发现己卯本上的“禔”、“祥”、“晓”字，是避怡亲王“永祥”和“弘晓”之讳，这确实是在研究己卯本的来源方面的重大贡献。但是，吴恩裕和冯其庸二位先生认为己卯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弘晓家的原抄本”^①，则大可商榷。虽然我原来也接受了这样的认识，但在仔细对比校勘这两个抄本又复研读了研究此两本的文章之后，却感觉那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②。事实上，己卯本并不象是怡府的原抄本。

但是，为什么己卯本上有一些讳笔的“禔”、“晓”之字呢？梅节先生已经指出：“己卯本的讳笔，证明它的确出自怡府，但是它的避讳很不彻底，却又说明它不一定是怡府原本，而更可能是怡府本的过录本：有些抄手过录时保留原本缺笔字，有些抄手则加以改正。”这样的分析实在是客观的，是符合己

卯本现状的。

己卯本由五至七人分抄，有几个抄手的笔迹既出现在前四十回，也存在于后四十回^⑩，而且这两部分都有讳笔的“禛”字，这就说明己卯本的前四十回和后四十回是同时过录的，它们来源于同一底本——怡府原抄本。己卯本大致反映出怡府原抄本的面貌，而已卯怡本（怡府原抄本）又有可能是直接过录自脂砚斋手中的本子。所以，己卯本的来源问题已经随着讳笔字的解决日趋明朗化，而庚辰本的来源则是一个待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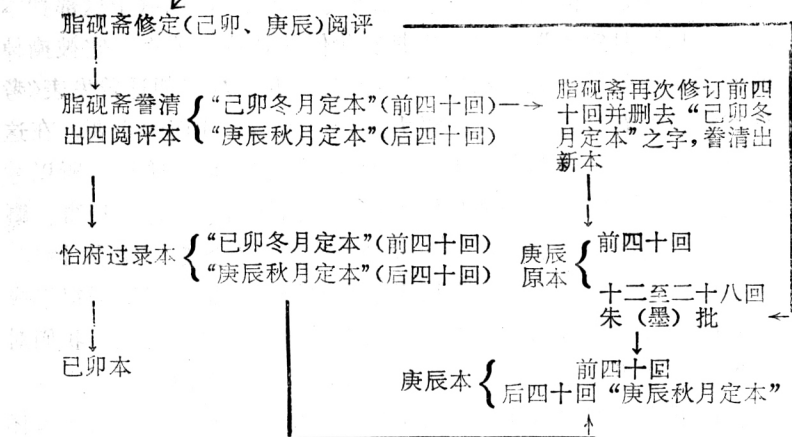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庚辰本的前四十回与己卯本的前四十回异文很多，这说明庚本前四十回来源于脂砚斋再次修订过的己卯本前四十回的祖本。庚辰本后四十回与己卯本异文很少，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来源于己卯怡本，二是来源于脂砚斋再誊清的己卯本之祖本。

我认为，庚辰本上之所以没有“己卯冬月定本”的题字，是因为脂砚斋对这部分又作了文字方面的修订，所以在誊清的新本上不能再保留这条已不符实的题字，庚辰本正是这个删去了“己卯冬月定本”题字的脂本的转抄本，也就不可能有这条题字，这是从两本前四十回既有大量异文，又均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题字之现象上可以清楚看出的。庚辰本后四册每册首均有“庚辰秋月定本”的题字，其正文又与己卯本大体无差，则又说明己卯本后四册很可能也有这条题字。现在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后四册册首大部散失，现存的只有第七册（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总目页，而这张总目页又恰巧在“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以下撕去了与庚辰本相对应正好应当写这条题字的页角，所以，在现存的己卯本后四册上看不到这条题字了。现在看不到并不等于原来没有，从己、庚两本后四册文字大体相同的情况看，脂砚斋并未对这部分再作细致地、系统地修改，所以也就不会删去这条题字。我认为，在己卯本后四册（即第五、六、七、八册）总目页上很可能

原有“庚辰秋月定本”的题字的。己卯本第七册总目页那一角很可能与这条题字有关，也就是说，很可能是有意撕掉的。撕去这一角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己卯冬月定本”，以赋予这部抄本比“庚辰秋月定本”更早、更具有价值的地位。那么，它被撕掉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九二八年以后，因为一九二八年胡适曾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极力宣传甲戌本是如何的重要，在这以后《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及其价值才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才出现了刚好在写“庚辰秋月定本”之字的纸角被撕掉的巧事。事实上，这条题字失去以后（如果己本此处确有这条题字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己卯本属于配本的嫌疑。根据胡适买得甲戌本时即发现“首页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的情况，我们对己卯本上述“缺角”现象发生疑问是完全有理由的。

庚辰本后四册可能过录自怡府本，除去其与己卯本文字大体相同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庚辰本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所撰《芙蓉女儿诔》末句“成礼兮期祥”中，“祥”字缺最末一笔作“𠄎”。这个“𠄎”字不大可能是错字。虽然庚辰本最后十回（第七十一至八十回）的错字非常之多，己卯本同处之“祥”字是否缺笔也不清楚（己卯本现缺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但是，在已考清己卯本上许多“祥”“晓”字的缺笔与避怡亲王“允祥”“弘晓”之讳有关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不对庚辰本上亦缺笔的“𠄎”字采取审慎的态度。所以，庚辰本上的这个“𠄎”字很有可能是与己卯本一样的讳字，因此也就存在着庚辰本后四十回过录自怡府本的可能性。我们把这种关系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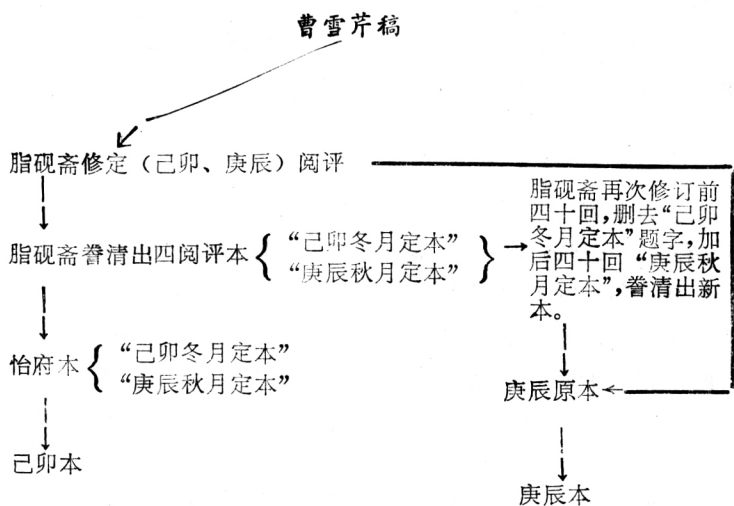
曹雪芹稿



但是，由于庚辰本的前四册和后四册是由相同的几个抄手抄录的，很难说有什么理由在后四册另换底本。如果前一个底本只有前四十回，则完全可以在初始时即用怡府本的，所以说，庚本后四册过录自己卯本之底本——怡府本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的。相对地说，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即庚辰本第七十八回的“谿”字是出于怡府后人之手，也即是说，参加抄录庚辰本的人中有怡府的后人，此人在抄录第七十八回的《芙蓉女儿诔》时出于习惯顺笔写上了“谿”字。这样看来，庚辰本全部（七十八回）都是从脂砚斋又眷清出的一部完整的（八十回本，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本子过录的。这样的推测可以使两本间的大量异文和讳笔“谿”字都得到圆满解释。

我们分析己卯、庚辰两本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脂砚斋在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修定了《石头记》的前四十回，同时作了阅评，写下不少朱（墨）批语，并在此年完成部分的最

后一册——第四册总目页上题“己卯冬月定本”之字。紧接着于次年即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完成了对后四十回的修定，接着作评批，并在后四册各册总目页上均注明“庚辰秋（月）定本”。这样，脂砚斋便完成了四阅评本的修定阅评工作。这一修定是在曹、脂自用本上进行的，因此他又必须誊清出一部可供外人传抄的本子，在此本上没有过录己卯年和庚辰年的朱（墨）批。怡府据以过录的正是脂砚斋的传出本，所以也就没有朱批。庚辰年以后，脂砚斋再次修订了四阅评本的前半部分，并删去了“己卯冬月定本”之字，加上四阅评本的后四册便构成了一部新本，此本未作系统的阅评，故仍然保留了“脂砚斋凡四阅评过”题字。我们称此本为“四阅评本修订本”或“四评改本”，现庚辰本即是此本的繁衍本。过程如下图：



以上只是对于己卯、庚辰两本形成过程的大概推测，其间有许多细节尚不明确。例如，庚辰本的原抄主是谁？是在哪一年过录的？其底本上的朱批是在哪一年过录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现在

就能完全解决的。

庚辰本既不是从怡府本过录的，也不是直接从脂砚斋或曹雪芹自用本过录的，这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庚辰本上有大量的与正文同时过录的朱（墨）批语，己卯本的原貌却是一清如水，点朱皆无，这说明了庚辰本上的朱批并非来源于脂砚斋传出的四阅评本，脂砚斋传出的己卯冬月和庚辰秋月修定完成的四阅评本，以及四评改本上均没有朱笔眉批、行间批和回前回后批。脂砚斋于己卯、庚辰年所作的评语只是批在自用本上的，在这个本子上，脂砚斋和他去世后的重要评批者畸笏叟不断地、反复地阅评，因此，不但有己卯年的朱（墨）批，而且还有壬午、己酉、丁亥夏的大量批语。庚辰本第十二至二十八回的大量朱（墨）批正是来自此本。这即是前面所说的吴世昌先生关于“脂京底肆”问题的论述所给予我们的启示。结合前文关于庚辰本朱批是与正文同时过录的分析，就可以明白看出，庚辰本是从一个补抄了大量朱批的本子过录的了。所以说，庚辰本只是一个再过录本。

四、关于己、庚两本前十一回的底本来源问题

己卯本有回前附加页的共有七回，即第十七、十八回，第十九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三十六回，第三十七回。庚辰本除总目页和只写有“石头记第×回”的附页外，有回前附加页的共二十一回，即第十一回，第十七、十八回，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二回，第二十四回，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三十六回，第三十七回，第三十八回，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六回，第四十九回，第五十四回，第七十五回。其中，第十一回前附页上的朱批是来源于另本（后文详论），第二十一回前记有总评的附页错编在第二十回后（这是可以从总评与正文的对照中很容易看出的），第二十二回前附页上只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几字，其它附页

上所录的皆是总评或重要的记录（如庚本第七十五回前附页）。并且，所有记录回前总评的附页全部集中在第十一回以后（己卯本亦如此）。这一现象，说明脂砚斋于“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时是将回前总评另写一页附于回前的。没有回前附页的诸回便没有回前总评。与这一现象矛盾的是，己卯、庚辰两本第二回前虽然没有记录总评的附页，却在回目之后正文之前有一大段总评，这段总评占了将近一页（两面），显然非属误抄。

《石头记》现存诸抄本第一回前皆有一段楔子。己卯本第一回前现缺三页半，从庚辰本来看，这楔子在己卯本上原也必有的。庚辰本第一回前的楔子是抄在回目之后，正文则以四句诗起头，而已、庚两本第二回前这段文字也是写在回目之后，四句诗前。从它的内容和无旁批的形式上看，倘若说是回前总评，倒不如说是题解，但无论是总评或是题解，其作者必不是曹雪芹。这一点可以在甲戌本上得到很好的证实。甲戌本第一回前的楔子是作为正文的起首部分，用与正文相同的格式抄写，而第二回前的这段文字，虽然也是写在回目之后，却采取了比正文低一格的方式来与正文相区别，甲戌本的这种格式是合理的、正确的。在甲戌本现存的十六回中，除我们已经指出的第二回外，还有七回有回前总评，即第六回，第七回，第八回，第十三回，第十四回，第十五回和第十六回，这七回总评的抄写格式与第二回前总评一样，都是低于正文一格的。这样的格式，使人一眼明了哪些是正文，哪些是总评，同时又暗示了各自的著者，既然《石头记》的正式命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回前总评就一定出于脂砚斋之手。顺便提一句，从甲戌本《凡例》亦低于正文一格的形式上看，《凡例》亦应是脂砚斋所作。

己卯、庚辰两本第二回起首这段文字既是总评，为什么没有采取与其它有回前总评的诸回相同的方式抄录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另用一纸附于回前呢？这就使人不能不产生它与其后有

总评的诸回是否出于同一祖本的疑问了。所以，吴世昌先生提出庚辰本前十一回出自另一种本子的推测是不无道理的。

吴先生早已指出，庚辰本前十一回与后面诸回是来源于不同的底本，并且还列举了不少的材料予以证明。然而遗憾的是，吴先生这颇具卓见的发现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吴先生指出，庚辰本前十一回没有正文中双行小字评语，但从甲戌本和其它脂抄本可知前十一回独多评语，庚辰本每册首又均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题记，“则称‘四阅评过’，何以第一册中的前十回，第二册中的第十一回，全无评注？这十一回，分明是从一个连‘一次’也没有‘评过’的白文本抄来的……”^②。我们并不认为庚辰本前十一回与后面诸回是庚本抄主用两个不同的本子过录的，我已经指出了，庚辰本是一个整体，全部七十八回是同时从一个底本过录的。此点与吴先生的认识不同。但是，吴先生的论述却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庚辰本的前十一回与后面诸回必来源于两种脂本（己卯本亦是如此，吴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冯其庸先生不同意吴先生提出的庚辰本乃是一个“集锦本”的观点，认为，“庚辰本从头至尾，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早期原缺的两回当然不计在内），都是从己卯本抄来的，并没有根据什么“连‘一次’也没有‘评过’的白文本”。“全部八十回（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一个整体，它是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本子……。”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论述过，庚辰本并不是从己卯本过录的。但是，退一万步说，即使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庚辰本和己卯本前十一回的底本（或祖本）是无评的“四阅评过”之本的奇怪现象，也丝毫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既然说庚辰本和己卯本前十一回与后面诸回同属“脂砚斋凡四阅评过”本之过录本，那么，无双行小字评语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梅节先生认为，“原来脂砚斋写定本时，前十一回的形式大概相同于甲戌本的前五回，只有朱笔眉批、行间批，而没有整理

成双行批注（这牵扯到原先的体例）。怡府过录时，也分朱墨二色。但到现存己卯本、庚辰本（或其底本）过录怡府本时，因为抄手要赶时间，省成本，便决定只抄墨笔，而前十一回就一清如水。”我认为，梅先生的推测亦不够圆满。因为，如果脂砚斋四阅评本“前十一回的形式大概相同于甲戌本的前五回，只有朱笔眉批、行间批，而没有整理成双行小字批注”，怎么到了后面同是四阅评本的诸回，却一反前辙了呢？如此抄录，其意何在？难道前十一回的批语不比后面的重要么？

己、庚两本前十一回之所以是白文本，并不如梅节先生推测的那样，而是另有原因。我认为，考清这个原因的正确途径，仍是建筑在对此两本的对比分析之上。

己卯本中有六张浮条，其中一张是用墨笔从它本抄录的“护官府”及其注文。“护官符”同己、庚两本墨抄正文相同，下面的注文却是己、庚两本正文所没有的（基本上与甲戌本注文相同）。重要的是，在甲戌、己卯、庚辰这三个来源于早期脂本的抄本正文中，已明确地在门子口中说明：“护官符”之“下面皆注着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照样抄写……。”就是说，在曹雪芹原作上（或者说原本上）“护官府”下应有墨笔（双行小字）注文。甲戌本现在的注文是以朱笔作行间批，说明它的抄主自作主张，将其作为评语而摘到了行间。由此可知，甲戌本（或其底本）不但改变了原本的抄写格式，而且还将一些双行小字评语用朱笔摘了出来。但此处要讨论的是，在己、庚两本中，“护官符”下为什么没有注文？是它们各自的抄者自行删去的，还是各自的底本上即没有？

从己、庚两本的整体上看，十一回后有大量的双行小字评语，前十一回却几乎没有此类评语，又据甲戌本可知前十一回应独多评语，所以，按常理说“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之本的前十一回也应有大量的双行小字评语。现在己、庚两本之所以没有，不可能是被抄录者删掉的。己、庚两本是各据个的底本过录的，这就

反映出它们的共同祖本——脂砚斋的四阅评本与四评改本之底本是由两种本子组合而成的“配本”，前十一回是由一个与后面诸回不同的稿本稍加修改过录而来的。这个稿本几乎删掉了所有双行小字评语、眉批和行间批，只保留了回前总评（“护官符”下注文亦被当作双行小字批而删掉，可见删削之彻底）。于是就为我们称之为白文本的样子。

那么这个删去了双行小字评语的本子又是哪个时期的本子？脂砚斋为什么要用它与其它文本组合配备四阅评本呢？我们仍需从这个“白文本”自身发掘材料，寻求答案。

首先，这个本子有如下特征：

- （1）回前总评写于回目之后、题诗之前。
- （2）把“英莲”这一早期人名改成“英菊”。
- （3）只有十一回。

（4）删去了所有双行小字评语，无行间、眉端朱批（指白文本原本而言，己、庚本现有的几条双行小字批和行间批是脂砚斋后加的）。

现逐一分析这几条特征：

（1）根据甲戌本回前总评一律抄写在回目之后、题咏之前的现象可知，这个“白文本”是属于己卯年以前的脂本。“己卯冬月定本”时，回前总评已用另纸附于回前了。

（2）根据甲戌本行间朱批，我们知道曹雪芹给香菱取名“甄英莲”是取“真应怜”之谐音。在“白文本”上，“英莲”被改作“英菊”，说明“白文本”是甲戌年以后之本。现存诸脂评抄本中，只有己卯、庚辰两本前十一回出现“英菊”之名，可见这个把“英莲”改作“英菊”的“白文本”未曾流通。

（3）四阅评本中的这“白文本”之回数，既不能被四除尽，又不是十回整数，说明它不是完整的一册或数册，所以它只有十一回之数。如果“白文本”多于十一回之数，脂砚斋为什么

只取十一回配备四阅评本呢？

(4) 已如前述，原来的白文本是经脂砚斋删削评语的本子，又由脂砚斋将其过录到四阅评本之中。

脂砚斋为什么要在一个“重评”本中删去双行小字评语及眉批、行间批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为省纸张。但从脂砚斋对《石头记》反复阅评、誊清的现象看，此可能性并不大。二是为誊清出清洁的文本以便于雕版印刷。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在《丙子对清考》中已经论述过：(一) 在甲戌年（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前曹雪芹就已经完成了《石头记》的全部写作，在甲戌年经脂砚斋誊清出过完整的全本——甲戌原本。(二) 我们现在所见脂抄本之所以是残缺不全之本，是由于《石头记》曾发生“被借阅者迷失”文稿事件而出现的。畸笏叟和脂砚斋的“被借阅者迷失”、“迷失无稿”、“此后破失”、“缺……诗”等批注，乃是指同一次迷失文稿事件而言。(三) 根据畸笏“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被借阅者迷失”之批可知，迷失文稿事件既不是发生在誊清之前，也不是发生于誊清之后，而是发生在某次誊清之时，此次“誊清”未出全本，誊清稿必少于二十二回（因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末即有“破失”及佚文记录）。(四) 又据四阅评本即已有“破失”，丙子年（乾隆二十一，一七五六年）便有“缺……诗”的“对清”记录，可知此次迷失发生在丙子之前，甲戌之后。所以我曾推测，所谓“丙子对清”，其内涵即是：（完整的稿本）在被借阅者“迷失”“破失”一部分文稿后，残余散稿自身的清理成回、对合成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清”所包括的清理、对合作在四阅评本上的现实反映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吴世昌先生首先指出的所谓“白文本”乃是乙亥年（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脂砚斋为准备付诸印刷流传而誊清之本，可称之为“乙亥本”。

现推测全部过程是这样的：脂砚斋在乙亥年欲誊清出一部准

备付诸印刷之本，所以在此本上未录双行小字批语，只留回前总评（因批语数量非常之大，有些部分甚至与小说正文字数相当，而在那时印一部书是要花很多钱的）。誊清工作在刚刚完成十一回时，因底本——甲戌原本借出而暂停，又因借出之本被“借阅者”严重“迷失”和“破失”而终止。脂砚斋之所以在丙子对清工作完成之后，用两个明显不同之本组合配备四阅评本，正是因为这个无评的“白文本”——乙亥誊清本仅有十一回，又因为乙亥誊清本是距此时间最近的誊清本，弃之不舍，故此保留。保留的目的无非是要待雪芹将失文补齐后，继续以这十一回本的形式整理出付诸排印之本。将《石头记》印刷流传，这才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等人的最终目的。

一言以蔽之，脂砚斋四阅评本前十一回的来源，是他的乙亥誊清本。（待续）

注释

⑳同注㉔

㉑见吴恩裕先生《曹雪芹丛考》第223页。

⑳我在《怡府失稿说质疑——与赵冈先生商榷》一文中，曾认为己卯本是怡府的原抄本。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既然己卯本不是怡府的原抄本，那么赵冈先生以此本为多人分抄的现象来判断《石头记》的部分“迷失”文稿事件，是由怡府过录时造成的，就更难以成立了。

㉓因己卯本有一部分散失，故在散失部分中也可能还有参加前四十回抄录的抄手笔迹在后四十回存在。

㉔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55页。